

中国各民主党派历史研究丛书

彦 奇 主 编

中国民主建国会历史研究

（民主革命时期）

陈竹筠 编写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D/13.4
/2

32626

中国各民主党派历史研究丛书

彦 奇 主编

中国民主建国会历史研究

(民主革命时期)

陈竹筠 编写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中国各民主党派历史研究丛书

中国民主建国会历史研究

(民主革命时期)

彦 奇 主编

陈竹筠 编写

•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本社内部发行

•

开本：850×1168毫米32开 印张：2.25

1985年5月第1版 1985年5月第1次印刷

字数：52,000 册数：3,000

统一书号：11011·122 定价：0.39元

目 录

一、中国民主建国会的建立	1
(一) 中国民族经济濒临破产，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内和平 政治局面的暂时出现	1
(二) 民主建国会的建立及其政治主张	6
(三) 民主建国会地方组织的建立和它所开展的宣传工作	17
二、中国民主建国会为争取人民民主和国内和平而奋斗	26
(一) 民主建国会密切配合政协代表，力促政治协商会议 的成功	26
(二) 民主建国会坚决反对内战，力争国内和平	36
三、中国民主建国会坚持政协决议，积极反对蒋介石 独裁、内战、卖国政策的斗争	44
(一) 民主建国会反对伪国大、伪宪法及国民党改组政府	44
(二) 民主建国会抗议美军暴行，积极声援爱国学生 运动	46
(三) 国民党强化法西斯统治，民主建国会被迫转入地下 斗争	51
四、中国民主建国会响应中国共产党“五一”号召，为 创建新中国而奋斗	55
(一) 民主建国会在人民解放战争胜利发展的鼓舞和推动 下，更主动地参加人民民主统一战线	55
(二) 民主建国会响应中国共产党“五一”号召，与美蒋 反动派的公开决裂	57

(三) 民主建国会积极参加新政协，为创 建新中国而贡献力量	63
后 记	68

一、中国民主建国会的建立

(一) 中国民族经济濒临破产，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内和平政治局面的暂时出现

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民族资本主要指中等资产阶级的资本，基本上代表自由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它是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以及官僚买办资本的压迫与排挤下求生存的。由于它在政治上、经济上的软弱性，它一直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没有成为中国社会经济的主要形式。在抗日战争时期，由于国民党政府的反动、腐败，以及自武汉失守后它采取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随着我国大片国土的相继沦陷，使民族工商业更遭到了严重的摧残。以纺织工业为例，在全国96个纱厂中损失了60个，纱锭、设备及织机均损失70%以上。再以面粉业为例，全国110个工厂损失了半数以上。^①上海是沿海工业大城市，损失更为严重，据上海社会局调查，被毁工厂约2,270余家，损失资本总额8万万元左右，其中虹口、杨浦两区各损失70%，闸北区则损失殆尽。^②上海51家缫丝厂中有47家被毁，约400家缫丝业中，有300多家毁于炮火中。^③幸存的少数工厂，在日寇占领之后也多被没收，或被强行以“合营”名义变相抢走。厂主对此稍有异言，就

① 见《抗战中的中国经济》，中国现代史资料编辑委员会1957年版，第121、122页。

② 见同上书，第124页。

③ 见同上书，第122页。

会招致倾家荡产，家破人亡。

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大后方，民族资本的遭遇也并不比沦陷区好多少。国民党以抗战为名先后实行的金融垄断、商业独占、工业统制、货币统制以及盐、糖、茶叶、火柴、卷烟、酒等“专卖”和花纱布“管制”等等反动政策，不但垄断了全国经济，使四大家族为首的官僚资本迅速膨胀，而且也严重地打击了民族工商业，使民族工商业不断破产萎缩。以全国钢铁生产为例，1940年至1943年3年中，铁的生产总额中，官营所占比重，由5.76%上升为50.96%，民营所占比重，则由94.24%下降为49.04%；钢的生产，官营由41.06%上升为91.65%，民营则由58.94%下降为8.35%。重庆是大后方工业中心，原有871家工厂，到1943年停工减产的达270余家。^①大后方另一个工业城市广西桂林同样如此，据1944年2月10日桂林《大公报》的报道：“目前各厂的情形，最多再维持半年或一年；一年以后，北极路（工业集中区）上不会再看见烟囱冒烟了。”重庆和桂林的情形，正是整个国民党统治的大后方的中国民族工业悲惨命运的缩影。

抗日战争胜利后，美帝国主义取代了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地位，要把中国变成它的附庸。蒋介石国民党坚持独裁和内战的反动方针，为了换取美援支持它发动反人民的内战，不惜丧权辱国，对美帝国主义实行门户开放政策，致使美国工业品、日用消费品象潮水一般地涌进中国市场，上海的各大公司，如永安公司等，美货竟占总货物的80%。另一方面，国民党反动政府又“接收”了日本侵略者多年来从中国人民身上刮去的巨量财富，据1946年7月国民党政府接收的这笔财产，全国不下四万亿元法币。^②加上它和美帝国主义勾结起来，进一步垄断了全国的金

^① 见李新等主编：《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236、237页。

^② 见1946年7月31日上海《大公报》社评。

融、工业、农业、商业及一切经济命脉，用通货膨胀、征粮、征税、经济统制等各种办法残酷掠夺人民，这样，不但工农小资产阶级倾家荡产，啼饥号寒，而且连民族资本也成了他们直接掠夺的对象。四大家族为首的官僚资本以比抗战前和抗战时期更快的速度膨胀起来。仅以工矿企业为例，在抗战前，官僚资本企业的资本占全国资本总额的10%，抗战期间占50.5%，到1946年上半年则占80%以上。^①与此同时，民族资本则陷入了破产和半破产的境地。这里仅以民族资本的主要阵地轻工业为例说明。如重庆的织布业，抗战胜利后，由于国民党军需署于1945年12月18日发布了至12月30日停止收购军布的命令，以及四大家族的中国纺织建设公司垄断了纺织业，致使生产军布的工厂已无法转产民用布，机器设备更无人收买，转产其他产品则又无资金可贷，结果只好破产倒闭。重庆南岸野猫溪川江布厂有80台布机，被迫停产后，全部拆毁当柴烧和卖废铁；重庆东亚布厂有90台布机，只剩下了3台，其余也全部拆毁。土布业更惨，一万多从业人员连稀饭都吃不上，有的不得不改行去抬滑竿和拉黄包车，有的摆桔柑摊。^②

对国民党反动派摧残民族资本的反动政策，民族资产阶级是极其不满的。除他们的代言人黄炎培在国民参政会上抗议，要求国民党政府不要“与民争利”，谴责其以“管制办法剥削工商”外，“迁川工厂联合会”、“全国工业协会总会”、“中小工厂联合会”也曾多次向国民党政府做过呼吁和请愿，要求解决内迁工厂的困难。但国民党政府竟以内迁工厂“倒闭有理”论来推诿

① 见笄移今：《节制资本的再认识》，载《经济周报》第2卷第18期。

② 见徐崇林：《中国中小工厂联合会纪实》，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重庆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重庆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1979年版，第103页。

和压制，说什么内迁工厂尽是些“破破烂烂的废铜烂铁”，“不如任其倒闭”，“才不致于被外国人所淘汰”。

抗战胜利后，民族工业的遭遇正如迁川工厂联合会在它们的宣言中所指出的，“胜利幸临，政府与各方订货大部取消，产品无从出售，遣散工友复费巨款，以至什九工厂变卖全部资产，犹不足偿其债务，工作陷于停顿，经济又濒于枯竭，物资乏款迁运，人员无法还乡，问天无语，呼吁无门，以善因而致恶果者，莫有甚于此者！”

迁川工厂联合会是抗战初期由上海及全国各地内迁的民族资本家开办的工厂组成的。它们为保护民族工业，冒着敌人炮火轰炸辗转迁移到大后方，备受艰辛，坚持生产，支援抗战。它们盼望抗战胜利重返家园，从事和平生产。但抗战胜利之后，它们却陷入了“问天无语，呼吁无门”的绝境。为了生存自救，它们不得不组织起来，向国民党反动政府进行斗争，争取经济民主。

还在日本投降以前，国民党反动派就为坚持其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法西斯专政，妄图消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独吞胜利果实作了准备。日本一投降，他们没有立即发动大规模内战，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的强大，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坚决反对内战，是由于他们还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因此，蒋介石从日本宣布投降的当天开始，就连发三封电报邀请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到重庆“共同商讨，事关国家大计”^①，企图以其“和平”假象来争取群众，孤立共产党，以便为发动反共反人民的内战制造舆论。

根据蒋介石玩弄的和平欺骗和准备内战的反革命两手策略，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制定了以革命两手反对反革命两手的方针，即一方面，力争和平，反对内战；另一方面，必须对蒋介石

^① 见1945年8月16日重庆《中央日报》。

发动内战的反革命计划做好充分准备，坚决保卫人民胜利果实，努力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的新中国。

中国共产党采取以上的方针，也是由于和平是当时全国人民的迫切要求。在全国人民反对内战、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不断高涨的形势下，国内有出现和平的可能。如果国民党愿意在和平条件下进行民主改革，对人民是有利的。因此，1945年8月16日中共中央向国民党提出了制止内战的六项要求。8月25日，又发表了《对目前时局的宣言》，向全国人民发出了“巩固国内团结，保证国内和平，实现民主，改善民生，以便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实现全国的统一，建设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①的伟大号召。8月28日，毛泽东毅然同周恩来、王若飞等乘飞机亲赴重庆和蒋介石谈判。经过43天的谈判，终于迫使国民党在《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上签了字。国民党政府不得不同意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坚决避免内战，建设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②的和平建国方针，并在《纪要》中宣布了国民党“应迅速结束训政，实行宪政”，以实现政治民主化；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保证人民有身体、信仰、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之自由”；承认各党派的平等合法地位；“严禁司法和警察以外机关有拘捕、审讯和处罚人民之权”；释放政治犯；实行地方自治等政治原则。

《双十协定》的签订，虽然还是纸上的东西，但它毕竟使内战的紧张空气有了缓和，使国内出现了一个暂时和平局面。这不仅使人们对和平有了一线希望，而且还把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的问题更迫切地提到了议事日程上来。因而中国社会各阶级、阶层的人们则都从本阶级的立场和愿望出发，考虑着这个关系自己

① 见1945年8月27日延安《解放日报》。

② 见1945年10月12日重庆《新华日报》。

前途和命运的问题，积极准备组织力量参加即将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以争取实现自己的理想和抱负。民族资产阶级也为这种政治形势所鼓舞，认为中国正“面临着空前伟大的黄金时代”^①。因此它积极要求组织起来，力争参加这场争取民主的斗争，以便通过政治协商的道路，实现对中国的政治改革，建立一个保护民族工商业自由发展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

中国民主建国会就是在民族资产阶级这种经济上求生存政治上争民主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开始其酝酿和筹备工作的。

（二）民主建国会的建立及其政治主张

中国民主建国会最早开始酝酿、筹建的发起人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以黄炎培为代表的与民族资产阶级有密切联系的中华职业教育社的成员和文教界的中、上层知识分子；另一部分则是以胡厥文为代表的迁川工厂联合会的主要成员以及和他们有密切联系的知识分子。

黄炎培（1878—1965）是清末的举人，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是老同盟会会员，曾任江苏学务总会常任调查干事和咨议局常驻议员。^②他参加过辛亥革命，曾任江苏省教育司长。他也参加过“倒袁运动”^③，并两度拒绝就任北洋政府的教育总长。他是中华职业教育社的创始人，并通过募捐创办了中华职业学校、鸿英图书馆等著名文化教育机构。

他在创办职业教育中，提出了“双手万能”，“手脑并

^① 见《中国民主建国会成立宣言》，载《平民周刊》（民主建国会成立纪念专刊），1946年1月出版。

^② 见黄炎培：《八十年来》，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版，第43、48、49、50页。

^③ 见黄大能：《忆念吾父黄炎培》，载同上书，第155页。

用”，注重实际的教育方针。^①因而他为不少“苦于就业难”的中学毕业生解决了就业的问题，同时也为民族资产阶级培养了不少有实用知识和专门技能的从业人员，这使他与金融、实业界建立了密切的联系。

黄炎培所领导的中华职业教育社，在其创办初期是不参与政治的。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他在上海组织了抗日救国研究会，并代表该会到南京质问蒋介石和王正廷（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长）“为何不抗敌”^②，积极地投入了抗日救亡运动。1932年“一·二八”事变发生，他除大力动员中华职业教育社全体成员支援前线外，还和上海各界代表发起组织了上海市地方维持会（后改组为上海市地方协会），为支援前线和维持地方秩序贡献了力量。^③在1937年上海“八·一三”抗战中，他又为支援前线作战，救护伤员，救济战区难民，推动民族工厂内迁等做了许多工作。^④他将中华职业教育社内迁到了西南大后方，并在各地设立了职业学校和各种文化机构。从此，他为全面抗战而奔走不息。中华职业教育社在他的领导下逐渐形成了一个有影响的与闻政治的教育团体。1941年，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时，中华职业教育社是发起单位之一。黄炎培曾担任民主政团同盟首任主席，以后始终是中国民主同盟的中央常委。抗日战争期间，他被任命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曾多次在国民参政会中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向国民党政府提出经济民主、政治改革和团结抗战的要求。1945年7

① 见《中国民主建国会主要创始人小传》，载《文物》1981年第2期。

② 见黄炎培：《八十年来》，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版，第91、92页。

③ 见同上书，第92、93页。

④ 见同上书，第93页。

月，他为了了解中国共产党和它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的真实情况，曾和参政员褚辅成、章伯钧、冷遹、左舜生、傅斯年等人一起访问了延安。在这次访问中，他受到了很大教育，归来后把他在延安的日记整理成为《延安归来》一书，并冲破国民党的书刊检查制度秘密地出版了。由于这本书比较客观地报道了延安抗日根据地的真实情况，所以在一定程度上澄清了国民党特务对共产党和抗日根据地的造谣和污蔑。为了抵制国民党官僚资本的压迫和排挤，他从1942年起就开始酝酿组织“国讯同志会”，准备以此为基础组织一个代表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团体。为此，他曾在与民族资产阶级有联系的知识分子中进行串联，后因国民党政府的阻挠，他的愿望未能实现。抗战胜利前后的国内形势，又促使他重新加紧了这方面的准备工作。

与此同时，以胡厥文为代表的迁川工厂联合会的部分领导成员也开始了酝酿和建立组织的工作。胡厥文是一位从事机器制造业的爱国实业家。1918年毕业于北京工业专门学校机械科。1922年在上海创办新民机器厂，同时受聘于上海大实业家穆恩再筹办的机制窑厂和恒大纱厂，任经理和厂长。他的经营管理才能很受实业界的重视和推崇，自1927年就被选为上海机器同业公会主任，并连选连任十多年。1932年“一·二八”事变时，他以强烈的爱国热忱动员同业拆迁机器到沪南，日夜为奋起抗日的十九路军赶制武器。1937年上海沦陷前夕，他为支援抗战和保存民族工业，和颜耀秋、文秉渊等动员了146家同业工厂内迁到了重庆和桂林等后方城市。这些工厂企业在工人被抓丁，以山洞做厂房的困境下，一直坚持生产，为抗战做出了贡献。1938年在重庆成立了迁川工厂联合会。胡厥文先后被选为副理事长、理事长。国民党反动政府对民族资本的摧残，引起了胡厥文及其所代表的迁川工厂联合会成员的强烈不满。胡厥文在他所写的文章中曾痛心疾首地说：“决不能眼看内迁工厂一个一个地消失，艰苦奋斗的工

人一个一个地失业，有功抗战的资本一笔一笔地耗损，热心爱国的情绪一天一天地消沉”。由于他深感在国民党反动政权的统治下民族资产阶级要争生存、图发展，就一定要组织起来，所以，他在抗战胜利前后，通过迁川工厂联合会，在工商界的爱国人士中开始了酝酿和建立组织的活动。

胡厥文既是迁川工厂联合会的理事长，又是中华职业教育社的理事，和黄炎培的关系至为密切。1945年8月21日，黄炎培和杨卫玉一同去访问胡厥文，他们就建立组织问题取得了一致的看法，并商定了串联的对象，决定立即着手筹组工作。从此他们每周都以“星六聚餐会”的名义进行酝酿。最初参加酝酿的，除黄炎培、胡厥文、杨卫玉等人以外，还有章乃器、林继庸等人。随后则有迁川工厂联合会的胡西园、吴羹梅，中华职业教育社的孙起孟、张雪澄。正在筹组中小工厂联合会的负责人徐崇林，四川省银行经济研究处的负责人施复亮以及从事社会救济事业的章元善，金融界的黄墨涵等人也陆续参加了酝酿和串联。经过十多次的酝酿和串联，参加发起的人数不断扩大，遂于1945年11月28日，在迁川工厂联合会（重庆市江家巷1号）正式成立了“中国民主建国会筹备会”。参加筹备会的成员共30人，推选黄炎培、胡厥文、章乃器、胡西园、孙起孟、章元善、施复亮、鄧云鹤、胡子婴、辛德培、黄墨涵、张雪澄、陈钧、徐崇林、周焕章等15人为筹备干事。12月7日，又假迁川工厂联合会召开了第二次筹备会，决定于12月16日正式举行成立大会。从1945年8月21日第一次串联会至成立大会，他们前后共举行了十多次酝酿会，两次筹备会和四次筹备干事会。在筹备过程中，除推选章乃器等负责起草政纲、组织原则、章程及宣言等大会重要文件外，迁川工厂联合会、全国工业协会及其重庆市分会、西南实业协会、中国生产促进会和重庆市国货厂商联合会等团体的有关人员，还利用“星五聚餐会”和茶会等方式，多次交换意见，商讨了民主建国会的

政治主张和组织原则等问题。

1945年12月16日，中国民主建国会在重庆白象街实业大厦举行了成立大会。出席大会的成员共93人（实际签名参加发起的人数有134人；抗战胜利后复员离开重庆的部分成员未能参加，也有一部分人因各种原因不便公开出面活动）。

大会选举黄炎培、胡厥文、黄墨涵为主席团。由胡厥文致开幕词，他阐明了筹建民主建国会的宗旨。指出：“本会之筹设，其最大目的为促成民主。”因为“抗战八年来，工业家前仆后继，努力为国奋斗，而抗战结束之今日，形成工业萎缩，考其原因实由于不民主”。接着他阐明了民主建国会的基本原则，就是要“保持民主精神”。指出“本会非少数人垄断之团体”，要“牺牲小我，完成大我，以国家民族为前提”。并说民主建国会是“代表全民的，不愿任何党派操纵本会”。最后，表示“不屈服于任何威力，以大公无私的精神积极奋斗到底”^①。黄炎培报告了民主建国会的筹备过程，强调指出民主建国会的立场“是站在民众立场”，“不依靠特殊势力，完全依靠民众”。“本会各分子，均有正当社会岗位，没有以政治为职业者，决不做某一党某一派之尾巴；但亦决不排斥任何党派，对于人民有利之行动，我们都赞成，反之，有害于民之行动，我们坚决反对”。最后，他还阐明了民主建国会的几个特点：（1）“不与人争”，强调“本会有别于一般党同伐异之政党，但仍需辩明是非，为人民谋幸福，不受任何威胁，力争公道”；（2）拒绝现役军人参加，以贯彻“军人不宜与闻政治之主张”；（3）“提倡民主，力避少数人负责，多数人旁观”，为此“不采用固定领袖”；（4）成员“是以产业界及文化教育界人士为主体”，但“十分注意从

^① 见《民主建国会成立大会纪要》，载《平民》周刊第1、2、3期合刊（1946年1月），第21页。

业青年之培养”，以使“全国从业青年联合起来”，再以一般从业青年“影响工农大众，工农大众站起来，男女老少一致合作把全人类救起来”^①。接着会员代表致词，彭一湖、黄墨涵、章乃器、胡西园、王之轩等分别表述了各自对民主建国会的态度和主张，虽然认识不尽相同，但都表示了要不偏不倚地“与闻国是”的共同政治立场。

大会讨论通过了宣言、政纲、组织原则和章程，并选出胡厥文、章乃器、黄炎培、胡西园、施复亮、吴羹梅、李烛尘、王纪华、杨卫玉、孙起孟、王恪成（绍鏊）、俞寰澄、张澍霖、鄧云鹤、胡子婴、徐崇林、黄墨涵、肖万成、毕相辉、夏炎德、林汉达、庄茂如、章元善、王靖方、王戟非、鄧公复、宁芷邨、范尧峰、王孝绪、漆琪生、林涤非、姜庆相、陈钧、文先俊、罗叔章、王之浩、周勛成等37人为理事；李组坤、阎宝航、冷遹、董问樵、彭一湖、贾观仁、张雪澄、沈肃文、魏如、杨美真、肖伦豫、胡景文、董幼嫻、邓建中、徐伯昕、刘伯昌、钟复光、刘丙吉、姚维钧等19人为监事。^②由以上理监事合组成的理监事联席会议，为民主建国会的最高权力机构。

12月19日，举行了第一次理监事联席会议。选出胡厥文、黄炎培、章乃器、李烛尘、胡西园、黄墨涵、施复亮、杨卫玉、孙起孟、章元善、吴羹梅等11人为常务理事；彭一湖、冷遹、张雪澄、李组坤、刘丙吉等5人为常务监事。会议决定，常务理监事联席会议负责处理日常事务。

12月20日，举行了第一次常务理事会，讨论和通过了设立中

① 见《民主建国会成立大会纪要》，载《平民》周刊第1、2、3期合刊（1946年1月），第21页。

② 见《民主建国会成立大会纪要》，载《平民》周刊第1、2、3期合刊（1946年1月），第22页。

央各办事机构及其负责人。决定中央设立秘书处、财务组、会员组、分支会组、言论出版组、技术研究组、事业推广组、对外联络组等。由孙起孟任秘书处主任，何萼梅、范尧峰任副主任；财务组由黄墨涵、鄢公复分别任正副主任；会员组由章乃器任主任；分支会组由杨卫玉、温仲六分别任正副主任；言论出版组由施复亮任主任，毕相辉、伍丹戈任副主任；技术研究组由胡厥文任主任，鄢云鹤、魏如为副主任；事业推广组由章元善任主任；对外联络组由胡西园、徐崇林分别任正副主任。

胡厥文和黄炎培在成立大会上所做的开幕词和筹备经过，反映了民主建国会的政治立场和主张，大会通过的民主建国会《成立宣言》、《政纲》、《组织原则》等文件，则更全面地反映了民主建国会的立场和政治主张。

《成立宣言》首先阐明了组织民主建国会的目的，是使平民组织起来“积极与闻国事”。而使平民组织起来“与闻国事”的迫切性，就在于为什么“自命为‘万物之灵’的人类，依然在少数人的驱使之下，进行自寻毁灭的战争”，而“愚顽的特权阶级，依然在制造社会的矛盾，执行殖民地的黑暗统治，逼成玉石俱焚的流血革命，以自陷于覆亡”？这就是“因为全世界的平民没有普遍的觉悟，没有广泛的团结，因而不能够发挥他们潜在的伟大力量”。《宣言》认为原子能的发现，也未必能帮助人类恢复灵性，“只有平民普遍的觉悟，广泛的团结，才能建立真正的和平世纪，也才能保证和平世纪的存在”。在分析国内形势时，《宣言》认为中国“在数千年的帝王专制之后，又遭受了几十年军阀的蹂躏，官僚的压榨，政客的播弄和极端分子的搅扰”，“对外战争方始结束，空前的自相残杀的内战又在进行了”。《宣言》还愤慨地指出，“抗战八年，反而使一部分人更加混灭了人性！残酷、贪污、欺诈、腐化、颠倒是非、混淆黑白……一切都只有变本加厉，看来几乎不象人的世界了！”从而得出一个结论：